

居延考古与额济纳汉简（提要）

魏坚

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100872）

一、引言

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带，东西狭长，地域辽阔，地跨东北、华北、西北三大地理单元，北与俄罗斯、蒙古接壤，基本上是在北纬 41-42 度线上下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又重要的区域。这一区域，从东侧的大兴安岭南端向西是燕山山脉、阴山山脉、贺兰山、再西是新疆的阿尔泰山。我国北方的历代长城也基本分布在这条山系的南北，长城自然也就成了气候变化、农业和牧业的分界线。由此，这一区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往来征战，相互融合的一个舞台，因而颇具北方民族文化特色的古代文化遗存也就十分丰富。从这里兴起的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契丹、女真、党项、蒙古、满族等，先后在这里发展壮大，靠着强大的骑兵，如浪潮般一次次南下，越过阴山，入主中原，建立王朝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最后形成，不断注入新鲜血液，有的民族如汉代的匈奴，曾因其西迁而引起了世界性的民族大迁徙，如蒙古的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，曾写下了征服欧亚的历史壮举。

这些灿烂的古代民族文化遗存的发掘与研究，将会对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的历史过程，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。然而，历史文献的记载在这方面少而又少，错谬百出，《辽史》、《元史》等无不如此，因此考古学的研究就愈为重要。

二、居延概况

居延遗址位于额济纳河流域，其地南起甘肃金塔县毛目，北至额济纳旗苏古淖尔南端的宗间阿玛，全长 250 余公里。其中在额济纳旗境内分布约 230 公里，主要城址和重要遗存均位于额济纳河下游西至纳林河，东到居延泽的宽约 60 公里的范围之内，在这一区域内，目前发现有青铜时代遗址 1 处，不同时期的城址 13 座，墓葬区 6 处，汉代烽燧 118 座，西夏至元代的庙宇 10 余处以及大片屯田区和纵横曲折的河渠遗存等，是我国重要的大型古代遗址之一，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居延地区先秦时称为“弱水流沙”，秦汉以后始称“居延”，据学者考证，“居延”为匈奴语，是“天池”或“幽隐”之意，《书·禹贡》记大禹治水，为疏通九浚大川，曾“导弱水于合黎，余波入于流沙”。弱水即为今日之额济纳河，流沙则为居延泽。

当两汉之时，汉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匈奴，所以特别重视西北边塞的防务。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前 127 年），卫青收复河南地，重新修缮、加固了秦蒙恬长城。从集宁东南，大体沿北纬 41 度，循阴山南麓而西，直达乌兰布和沙漠边缘。此后于太初三年（前 102 年）又在阴山以北筑长城，“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（今包头至巴盟地区）塞外列城，西北至庐胸（qu）”（新疆阿尔泰山南麓），称为“外城”（今达茂旗向西，经乌拉特后旗至中旗境内）。大致在北纬 42 度线，西达额济纳旗苏古淖尔东北。与此同时，汉武帝又“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”，以遮断匈奴入河西之路，史称“遮掇障”。当时的居延都尉府就座落在居延泽西岸的绿洲上。因此居延一线是防御匈奴的战略要地。这里塞防工事向东与五原外城连接，向西南沿弱水（额济纳河—黑河）、疏勒河抵敦煌境内的玉门关，成为汉代最重要的防线。

汉代居延地区农业发达，是汉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，作为河西走廊的屏障，在汉对匈奴的战略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著名的甲渠候官治所破城子遗址，就以出土二万余枚汉简而享誉中外。

唐代在此设“宁寇军”统领居延军务，为防突厥侵扰，曾在居延筑大同城。唐代著名诗

人王维曾有诗作传世。

西夏至元代，是居延地区继两汉后的又一个发展时期。西夏王朝在居延设置了“黑山威福军司”和“威福军城”（即黑水城）。元代置亦集乃路总管府，其治所就是在西夏黑水城基础上扩建的黑城子遗址，蒙古语称作“哈拉浩特”。这一时期的农业相当发达，存留有较多的农田及河渠遗址。宗教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，各类佛教寺庙、古塔以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随处可见。

三、居延地区以往的盗掘与调查

科兹洛夫在 1903 年率领俄国远征队首次进入黑城，进行了一周的盗掘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，运走了大量的文物，现在藏于彼得堡；随后又于 1909 年 5 月，再次对黑城子进行了 8 周的盗掘，所掠文书、雕塑和青铜器等，整理成 40 多个包裹，掠往彼得堡。

斯坦因在 1914 年 5 月盗掘黑城，其发现虽略逊于科氏，但也将相当数量的文书和文物掠走，文书现藏于大英博物馆，其他文物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。

斯文·赫定在 1927 年—1934 年随中瑞联合考察团到居延，发现了很多亭燧障塞，并进行了发掘，主要获得一万余枚汉简，现藏于台湾。

1930 年，贝格曼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—汉代著名的居延边塞发现了总数达到上万枚的汉简，其年代几乎横贯了两汉的数百年。这在当时甚至今天都是震惊学术界的重大事件。在此之前，汉简的出土数量顶多是成十上百，在此 40 余年后，在破城子又有 2 万余枚汉简出土。当时有人曾将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 20 世纪西北两大发现。而居延汉简，是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之外，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。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，汉简研究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，成果丰厚，影响颇大，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成功范例。出土大批汉简的同时，贝格曼在额济纳还发现了可能是文明史上最早的纸，以及第一支完整的毛笔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于 1962 年—1963 年和 1982 年—1984 年也先后调查和发掘了黑城遗址，获取了部分文书、纸币等文物，对黑城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。

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划归甘肃建制时，曾于 1972 年—1976 年，对居延地区和汉代亭燧障塞进行了调查，并发掘了破城子和甲渠塞第四燧，获得汉简 2 万余枚。

近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居延地区进行了调查和复查，在对甲渠塞第七、九、十四、十六燧和绿城子的发掘中，获得汉简数百枚及一批珍贵文物。这些资料的获得，为居延地区的学术研究和遗址的保护规划、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。

四、近年来的工作状况和主要收获

最近几年在额济纳旗居延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，是近百年来居延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。主要表现在：

1、绿城子遗址的调查和发掘，确认了一处青铜时代遗址。绿城子遗址是一处椭圆形的古城址，东西长 435 米，南北长 345 米。城墙以黄土夯筑，经探沟解剖知，城墙地基在现今地表以下 180 厘米处，墙基宽约 3 米。现在地表以上的墙体以西墙和南墙保存较好，大部分地段经过汉代和西夏时期用不同的土坯修补，门址可能位于墙体的东南部。在城址内的北部高阜之处布 5×5 米探方 3 个，清理出椭圆形石片砌筑底基的房址 2 座，灰坑 1 座和墓葬一座。房址和灰坑内出有红陶直口扳手鬲、小口鼓腹大罐、敞口罐和灰陶小杯等；墓葬以裁出的河泥块垒砌而成，长 2 米多，宽约 1 米，中间偏一侧有一道隔墙，分别置有 1 具和 4 具人骨，均不完整，属二次葬。地表还采集到铜簪、铜锥等青铜制品。从文化面貌来看，应当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晚期遗存，时代属于西周阶段。

2、居延地区汉代城址和烽燧障塞的考古调查与发掘，取得重大进展。

(1) 基本搞清楚了这些城址，特别是烽燧的分布规律及相互关系，并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总结出：座落于不同地域和不同地形条件的烽燧障塞，是根据地形条件的不同而采取平

地叠砌、夯土包砌和台地分砌等三种不同的建造方式。史载，武帝“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”（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），额济纳河流域至居延泽一线的亭障设置，当是这一记载的直接印证。

（2）经过对居延汉代烽燧线的调查发现，分布于伊肯河两岸的烽燧基本都建有坞墙，同时，在烽燧线的西侧，发现了宽约9米的“天田”。在甲渠候官第九燧的发掘中，还出土了记载各燧分管“天田”多少里的木牌。证明了烽燧戍卒“以沙布其表，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”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，专司候望之职的真实性。

（3）在对几座不同结构的烽燧遗址发掘后，使我们了解到烽燧内分为烽台和居室两大部分的基本布局。同时，通过烽燧上部堞墙和转射、弓弩、虎落、羊头石的配置和房屋中灶台、暖墙、多层粉刷的墙壁及生活用品的出土情况，我们可以复原当时守边戍卒屯垦边关，且耕且守的生活场景。

（4）在甲渠候官所在的烽燧线上，大部分烽燧是经过多次改建的。通过发掘现场的观察发现，许多烽燧是在抹了草拌泥的原来的四周外壁上，再向外扩建1—2米。有的烽燧内部在发掘时，仅在东侧靠近门道的地方留有一间小屋，其它各室均已封堵，并可以看出其逐步封堵废弃的过程。有的烽燧内，在重新使用原来废弃的房间时，并没有将废弃时的沙土清理完，就在沙土之上再作改建。说明了这些烽燧是多次被废弃的，而且规模越来越小。这些情况同西汉中晚期势力较强，其后，从西汉末到新莽、东汉时，势力逐渐衰微是相一致的。

（5）发掘的5座烽燧出土了500余枚汉简，其年代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。我们可以获取大量的有关汉代边关行政设置、军事调动、规章制度、边关生活、生态环境和居民生业等方面的信息，为我们深入研究汉代居延地区的历史，探讨当时的汉匈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

3、对绿城之南和城东两处共150余座夯土高台建筑遗迹的性质给予了确认。这批夯土高台在前人的记述中，几乎没有提及。高台多以河里的胶泥土分层夯筑，一般厚10-15厘米，台子只夯筑四壁，厚约50-120厘米不等，基本呈方形，边长3-7米左右，高约3-6米。台子中间填充就地取出的沙土。台子多数为单体建筑，也有两个和三个一排的，既有南北向，也有东西向排列的。在分别对绿城南和东部2座夯土高台遗存进行发掘后发现，这些夯土高台是墓葬的墓上建筑。高台下方为墓室，多以青砖砌成。绿城东清理的M1，墓室分前、中、后三室，总长10米，其中中室略呈方形，前、后室呈扁长方形，以大青砖直砌墓壁，墓地铺有长方形青砖地面。墓葬顶部以长方形大砖券顶，墓门南向，墓道长约10米，斜坡式，两侧以土坯平铺叠砌，开口较宽，底部略窄。墓葬早年被盗，墓门上方有一较大的盗洞，墓内后室积土之上的墓壁上有大量烟垢。说明此墓被盗掘后，可能曾有人在此居住。清理到墓底时，发现有腿骨和其它零散人骨，并在后室出土1件基本完整的半圆形陶灶。根据墓室结构和出土的陶灶判断，这类墓葬当为魏晋时期的砖室墓无疑。

4、对居延地区的唐代遗存予以确认。唐代曾在居延筑大同城，以防突厥。大同城旧址即今位于黑城北约2公里的“马圈”城，现今内外两重城垣及东、西瓮城均有保留。城址略呈正方形，边长约110米。此城构筑方式完全不同于汉代障城，在城内发现较多的唐代瓷片。相传这类城址当年很可能圈养较多的马匹，故称“马圈”，现在其外城之内仍可发现较多的马骨；在其北约5公里处还有一座内外两重城垣的古城，名为温都格城，内城为一汉代的障城，外城则是以夯土筑成，大致长方形，东西长约90米，南北宽约70米，墙高约5米，宽约2、5米。城内有较多的唐代瓷片等遗物；另在小方城北端约10公里处的大方城遗址，为一每边长约70米的方形城堡，城四角有圆形角台，城门位于东墙正中，城堡内正中偏西处是一座高约9米的烽火台，烽火台以石片叠砌，上下插有3层木柱。城址内外发现了大量唐至西夏时期的瓷片。

5、西夏红庙遗址的发掘收获。红庙遗址位于温都格城东3公里处，由于遗址内存有大

量的砖红色筒瓦和板瓦而得名。2003年冬，由于一伙不法分子对这座庙址进行盗掘，使文物遗存遭到很大破坏。2004年6月进行了清理发掘。西夏红庙遗址为前、后两进殿堂建筑，门略向西南。后殿南北长约5米，东西宽约4米，地面正中为突起的泥塑莲花座，直径约150厘米，四壁发现有上下3层壁画，内容以坐式佛像为主，线条流畅，色彩艳丽。有的壁画早年已经被取下叠放在地面之上。殿内还发现了长约2米的卧式佛像，其中的一个佛头高近50厘米，神态安详。此外，还发现了用骨头雕刻的小佛像等。后殿门外两侧，还见有坐式佛像，惜已残破。前殿前半部亦遭破坏。庙宇后面紧贴后墙，建有两座佛塔，西侧一座尚保留大半塔身，东侧的只剩塔基部分存在。在庙址的东侧是一座建在夯土高台之上的多间房舍，应当属于红庙的僧房。

6、西夏黑水城—元代亦集乃路的新认识。黑水城位于达来库布镇东南约25公里的荒漠戈壁上。额济纳河原流经古城的南边，至今河道宽阔明显，但是由于河道改道，现今只是一条干涸的河床，沿岸原来的绿洲地带已经成为一片荒漠，到处都是枯死的胡杨和高大的红柳沙包。

西夏的黑水城的城垣规模不是很大，长宽各约240米，基本为方形。城内除有官兵住所外，还建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寺庙，以及少量民居。由于佛教的盛行，城内外都分布有佛塔等建筑物。

黑水城的城垣经过两次修筑，西夏时代的黑水城已经被元代的亦集乃路城址叠压和改建。西夏的黑水城大致位于元代城址的东北部，有东、西、南三座城门。原来的东、北两面城墙，已经被包筑在元代的延长的东、北两城墙之内；还有残留的南城墙的东面一段后来作为元代的广积仓的北围墙；南城门及瓮城元代被改建成了关押囚犯的天牢。原在城内西南角上的佛寺，元代仍在供奉，寺内后侧有三座并列的佛塔，成为后来元代城中心的标志点。

元代的亦集乃路城垣东西长438米，南北长347米，城墙用土筑成，高达10米，墙顶部残宽约2、5米。城内的四角有斜坡形蹬城的踏道，南墙正中也筑有斜坡形蹬道，蹬道都是双行道。城墙的东西两面开设城门，并加筑有瓮城。城墙外侧还加筑有马面，其中南北各6个，东西各4个；城外四角筑有高大的角台。元代扩筑的城垣，是延伸了黑水城的东、北两墙，增筑了南墙，扩大了城垣的西南部区域。原来的城垣范围就成了城内的东北区域。这样，城内的东北部分仍然是街市区域，西部和南部则是官署、寺庙和官员住宅区域。城内有三条东西向的大街，为城内主要街道，并僻有几条南北向的街巷，组成较为整齐的街区。自东城门进入的东街，直通至城中心有高台基的佛寺前，东街南面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大街，称为正街。这两条大街的两旁分布着店铺、作坊和民居。自西门进入的大街为西街，街北为总管府所在的大院落，街南分布有驿站、清真寺、佛寺等建筑物。城内佛寺多达6座，占地面积广大，成为这座边陲小城的一大特色。元代在城外还筑有佛寺和许多的佛塔。北城墙上甚至还筑有一座小佛殿，在西北角城墙上还建有大小不等的佛塔5座，最大的一座建在西北角台上，用土坯垒砌，为覆钵式塔，高达13米，经数百年风沙侵袭，依然耸立云霄，远在数十里外就可看到这座雄伟的古塔，成为黑城的显著的标志。

居延是一部厚重的史书，封存于戈壁沙漠之中，发掘和解读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，特别是为大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的依据，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。